

贵州改革开放40年丛书

铜仁卷

主 编：杜 丹
副主编：曹爱华 谢丹华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卷外情

贵州改革开放 40 年丛书

铜仁卷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贵州改革开放 40 年丛书·铜仁卷 /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221-14933-6

I. ①贵…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改革开放—历史—铜仁—1978—2018 IV. ① D61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8877 号

书 名 贵州改革开放 40 年丛书·铜仁卷
编 著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马文博

装帧设计 狮扬文化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550081

印 刷 深圳市泰和精品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4933-6

定 价 47.00 元

《贵州改革开放 40 年丛书》编委会

主 任：杜 丹

副 主 任：余 雄 覃爱华 夏 昆

成 员：郑 萍 张 骏 张 炼 赵 略 黄海林 潘圣群
韩江华 吴隆文 胡智勇 王淑芳 彭志伟

主 编：杜 丹

副 主 编：覃爱华 谢丹华

编辑部主任：郑 萍 刘泽海

成 员：余福仁 萧 强 徐 伟 李 波 胡 松 罗基仁
吴南剑 彭 辉 龙昭栋 黄 明 徐 燕 李慕航

专 家 组：肖先治 田 洪 覃爱华 李朝贵 余福仁

《贵州改革开放 40 年丛书·铜仁卷》

编写组组长：韩江华

副 组 长：彭 辉 梁跃军 徐明忠

成 员：张丽红 赵文长 黎启武 罗克瑕

本书获

2018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较大曲折，贵州认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即时结束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以此为起点，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正确道路，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贵州各族人民的面貌、贵州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伴随全国改革开放的脚步，贵州各级党委、政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为指导，结合贵州实际，正确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改革旧的体制机制障碍的同时，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为全国改革提供了参考借鉴。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贵州各级党委、政府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跟时代步伐，紧紧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激发社会创新活力，改革开放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实现了后发赶超和历史性跨越。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贵州改革开放的40年，是贵州历史上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时期，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40 年的快速发展，构成了贵州改革开放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贵州紧紧抓住加快发展这一根本主题和结构调整这条主线，实现了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增强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为实现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国进入了新的时代，贵州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全省各族人民正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扬新时代贵州精神，为努力实现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贵州篇章而奋斗。

在改革开放迎来 40 周年之际，认真总结和研究贵州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是我们编写《贵州改革开放 40 年丛书》的初衷。当然，记叙这样近的、行进中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全省 40 年改革开放涉及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各地又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只能通过综述对这 40 年的历史作比较简要的回顾和总结，重点选取各个时期各地区有一定影响的事件作专题，进行较为完整的叙述。同时，书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难免有许多缺憾和不足，这些问题留待今后的研究和著述中加以完善。

目录

铜仁改革开放 40 年历程综述	002
-----------------	-----

第一章 春潮涌动 探索前行	030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 锐意开放	045
---------------	-----

第三章 夯实基础 跨越发展	063
---------------	-----

第四章 绿色先行 创新发展	094
---------------	-----

后 记	178
-----	-----



铜仁市行政区划图

铜仁改革开放 40 年历程综述

铜仁位于贵州省东北部、武陵山区腹地，东邻湖南省，北与重庆市接壤，是连接中南地区与西南边陲的纽带，素有“黔东门户”之誉，近有“中国西部名城”之称。铜仁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周时为荆州西部、梁州南面的边地，春秋时属楚，秦属黔中郡，汉属武陵郡，隋置静人县，唐分属思州、锦州、黔州，宋末元初设思州、思南两宣慰司。元代设“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隶属思南宣慰司，因有渔人潜入大江小江合流处的铜岩底捞出儒、释、道三尊像而得此名。明洪武五年（1372年）改“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为“铜仁长官司”，取“人者，仁也，渐仁之化”的含义。明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二（1413年3月3日）朝廷废除思州、思南两宣慰司，设贵州布政使司，下置八府，铜仁境内就有铜仁、思南、石阡、乌罗四府。之后数百年政区几经变迁。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全省设6个行政督察区，其中第六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铜仁，辖铜仁、江口、玉屏、松桃、印江、石阡、思南、德江、沿河九县，至此，铜仁地区建置基本固定。1949年10月，设中共铜仁地方委员会、铜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1月地委、专署进驻玉屏，1950年1月进驻铜仁县，辖铜仁、玉屏、松桃、江口、印江、石阡、思南、德江、沿河九县，1966年2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万山特区。1979年1月，撤销铜仁地区革命委员会，正式设立铜仁地区行政公署，作为贵州省人民政府行政派出机关的现行建制。

2011年，撤销铜仁地区，设立铜仁市。全市辖碧江区、万山区、江口县、石阡县、思南县、德江县、松桃苗族自治县、玉屏侗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以及大龙经济开发区、铜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土面积1.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40万，聚居着土家、汉、苗、侗、仡佬等29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0%以上。

铜仁地处黔、湘、渝三省（市）边界，是一座边境之城，地理位置独特，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湘楚文化、夜郎文化和五溪古文化在此相互交融，从而造就了既丰富多彩又独具特色且弥足珍贵的“边城文化”，其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求新、求变、求实的精神，在贵州历史长河中尤为突出。

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濮人曾以丹砂、短毛狗等方物向中原王朝进贡。约公元前11世纪，濮人与蜀、羌人等一起参加了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

湘西黔东一带，正是历史上濮人的重要聚居地，下司“撵山狗”、铜仁万山丹砂，天下知名。

铜仁是贵州省级行政区划肇始之地。元末明初之际，贵州之地由大小 100 余个所谓“世袭罔替”的土司统治，直至永乐十一年（1413 年），明朝平息了思南、思州两大土司政权后，实行“改土归流”新政，将其所辖 39 个长官司及其间一州一县分设为铜仁等八府，并建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总管八府和既有的一司三州，贵州便从此开始成为国之一省，铜仁由此被誉为“贵州开史的地方”。这一建制的形成，使得国家派遣大量军队驻扎黔境，由此带动大批移民前来经商、务农和经营各种手工业，大量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涌入贵州，对贵州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发展动力和思想冲击。被誉为“中国汞都”的万山汞矿遗址，真实再现了我国各个时代的汞矿生产状况，反映了我国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独特而且唯一。

铜仁也是全省文化教育中兴之地。思南府礼科左给事田秋有鉴于贵州文化教育的落后，为民请命，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 年）向皇帝上《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嘉靖十年（1531 年），上《请建务川、安顺、印江学疏》，奏请在贵州办学和独立设乡试考场。嘉靖十四年（1535 年），获得朝廷批准。嘉靖十六年（1537 年），贵州首次开科，从此贵州人才开发直追中原。李渭受王阳明影响，专攻“本心”之道，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心学”，终成明代著名的心学家。铜仁虽地处偏远，然而不乏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1895 年，廖袭华、李绍莲等铜仁籍举子参与联名“公车上书”，要求维新变法，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民主革命的先驱沿河人席正铭探求新的革命之路，组织 500 余人参加武昌起义。1919 年，席正铭更是向孙中山建言“中国应以俄为师”，孙中山对此深表同情。成长于石阡的邱石冥，于 1924 年创办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在重视笔墨、继承传统的同时，受故乡绝美山水的熏陶感悟，更重视师法自然，树起振兴中国画学的旗帜，其绘画作品、绘画理论、教育思想呈现出独特而不朽的价值，被誉为“中国美术界的精神领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铜仁籍的革命家和铜仁各级党组织在积极探索革命、建设和发展规律方面也有许多独立思考和独创经验，总结起来

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一条适合当地情况和特点的革命、建设和发展道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的周逸群、旷继勋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武陵忠魂周逸群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之后在创建湘鄂西苏区时，创造性地探索平原水网根据地“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毛泽东高度评价道：“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1]三任红军军长的旷继勋在攻打城墙坚固、敌方武器精良的新集镇的战斗中，指挥部队，用奇特的战术——坑道爆破，攻克了红军攻击多次未能拿下的堡垒，创造了红军战史上采用坑道作业爆破的成功战例，也使红军取得了攻坚战的经验，后又建立起鄂豫皖苏区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遵义会议召开前，贺龙、任弼时等于1934年6月19日召开的枫香溪会议，大胆地批评和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所带来的干扰，作出了创建黔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正确决策。而黔东南革命根据地得以在较短时间里建立和巩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红军针对民族地区实际，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赢得各族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1949年后，地委要求“苗汉杂居区的政权形式，应该是民族联合政府形式”，部署任何一项工作都要考虑到地方和民族特点。在具体工作方法上，善于因地制宜，大力开展工作革新和技术改造。地委强调“必须运用少数民族的干部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在少数民族旧有的风俗习惯上采用不同的工作形式去搞，防止一锅煮的办法”。在民族地区推行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建立民族卫生所，极大地增强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民族自豪感，激发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创造力。万山汞矿大搞技术革新，生产工艺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专区工业科研所试制的“四氟化铀”等产品达到国家先进水平。

历史证明，各级党组织一方面必须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则，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必须密切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如果故步自封、僵化机械，就会对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极大危害。“文化

[1] 毛泽东.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M]// 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大革命”就是极其深刻的教训。

时间到了 1978 年。这一年，铜仁地区的家底如下：工农业总产值 4.39 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3.18 亿元，工业总产值 1.19 亿元），国民生产总值 4.88 亿元，财政收入 3273 万元，粮食总产量 739382 吨。“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体制和管理经营模式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真正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根本组织模式和发展模式。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现实中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势在必行。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铜仁也毅然汇入了改革开放的洪流。回首铜仁 40 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005

1978 年底至 1984 年底，为铜仁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解放思想、改革起步。在这一阶段，通过对真理标准和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拨乱反正的同时，开展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体制改革。

思想建设上，开展真理标准和解放思想大讨论，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铜仁市区一角

想路线。1978年10月，中共铜仁地委召开地委常委会，学习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11月，地委又着重组织讨论了解放思想、打开禁区的问题。1979年2月，地委召开地直机关工作会议，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本区实际讨论党的工作重心如何转移的问题。之后，又多次召开会议，检查总结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讨论，不仅基本消除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影响和“两个凡是”的束缚，而且在解放思想中统一了思想，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政治建设上，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深入进行拨乱反正。先后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核查“三种人”办公室，有领导、有步骤，分批分期、全面深入地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集团性、政治性冤假错案和错划“右派”案件集中进行平反。对1957年以来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中的政治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和改正。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打三反”经济案件，以及其他违纪案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申诉案件，进行了复查和纠正。此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门桥

后又着重抓了各个时期政治案件的查漏补缺和善后处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大得人心，大顺民意，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贯彻落实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基本任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抓了机构组建和领导班子建设，理顺工作关系。1979年1月1日，铜仁地区革命委员会改称铜仁行政公署。1979年1月3日，组建行署党组。1979年1月10日，组建中共铜仁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此后，原区革委改为区公所。所有机关、工厂、生产大队、学校、商店和企事业单位不再设革命委员会。4月10日，成立地区编制委员会，着手对全区机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调整设置，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1980年后，为贯彻中央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精神，大胆使用一批中青年干部，尊重和发挥老同志的骨干作用，推进各级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使领导班子既始终保持老中青适当比例的最佳结构，又保证了党的路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经济建设上，开始农村改革和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为农村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1979年2月12日，中共铜仁地委召开地直机关工作会议，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如何转移铜仁的工作重心。会议气氛空前热烈，足足持续了十天时间。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张清田最后做了总结讲话，要求各级党委应充分认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意义，由此揭开了全区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随着农业政策的放宽，全区农民兄弟的生产干劲空前高涨。1979年春，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以包产到组、联产计酬、集体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迅速在全地区铺开，许多地方干脆一下过渡到包干到户。定产到户尚属集体劳动的性质，直接包干到户却引起了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针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对农村生产责任制形式问题，地委开展了深入讨论：对照政策，符合的就确定下来，不符合的也不一棍子打死，在深入调查研究后重新讨论确定，体现了分类对待、鼓励探索、不“一刀切”“一边倒”的积极而稳妥的原则。1981年3月，地

委从地直部门抽调近百名干部组成 26 个调查组，深入农村开展调研，在掌握大量农村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地委作出“凡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群众愿意实行的办法，都要加以肯定”的决定，实际上开了口子，保护了包产到户、包干到人的新生事物。1982 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确立，不仅给广大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还使一部分有技术专长和经营能力的农户得以集中资金和劳力在专业生产上发挥优势。同时，随着农业经济结构、作物布局的调整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劳动力向多种经营转移，出现了在家庭副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户。之后，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加速林牧副渔业的发展，逐步改善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引导农民发挥地方优势，发展区域经济。1983 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 88.132 万吨，比 1982 年的 77.215 万吨净增近 11 万吨，农村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也活跃起来，农村空前繁荣。在积极推行农村改革的同时，地委、行署贯彻落实 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逐步理顺农业和工业的关系，从 1979 年下半年起，对工业结构进行调整，增加日用消费品供应，对工业系统进行转化经营机制的改革和整顿，逐步实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权，同时改革企业领导制度，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工业生产稳定增长，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城镇个体户和私营经济大量催生。

社会建设上，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严打”为抓手，着手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在全区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活动和文明村寨建设活动，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改善城乡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使正常的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滋生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和刑事、经济犯罪分子及流氓团伙。这些犯罪分子活动猖獗，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83 年 8 月，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决定以三年为期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公检法机关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社会治安情况开始明显好转，有力地保障了改革开放的进行。

1984 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6 亿元，相比 1978 年的 4.39 亿元翻了一番多。这一阶段，在短短的五年多时间里，解放思想、发展经济、改革奋进的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是农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初步解决了全区人民的温饱问题，为即将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

二

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部署，标志着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铜仁的各项改革也由此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改革的展开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在随后长达八年的历程中，铜仁人民继续深化改革，大胆实行开放，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009

思想建设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旗帜鲜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全区大力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容，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中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调查，对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摸底、纠正。各级领导班子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认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认真开展学习研讨，统一了思想认识。对全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予以专门安排和督促检查。加强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性和长期性的认识，组织集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强调在斗争中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改革开放搞活，防止“左”和“右”的干扰。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政治建设上，突出抓了党政分开和组织整顿。强化班子建设。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实行党政分开、各负其责，实行分工不分力。规范制度建设。制定《中共铜仁地委工作规则》，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贯彻民主集中制和民主评议制，地委书记带头作对照检查。开展组织整顿，成立地委整党工作领导